

## 论罗兰·巴特文学文化批判中的“神话学”方法

龙佳解，肖小娅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罗兰·巴特认为神话是一种将社会的历史的东西加以自然化的言说方式。各种意识形态往往自诩为一种神话。“神话学”方法不仅分析批判各种文学和文化生产的历史性和暂时性，而且揭示出文学和文化的生产已经介入语言记号系统的意指活动之中从而使文化符号中包含的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自然化。“神话学”方法坚持历史主义和构成主义的结合。

**关键词：**罗兰·巴特 神话学 符号学 意识形态批判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罗兰·巴特在《罗兰·巴特自述》(1975)中把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从事的研究概括为：在马克思、萨特和布莱希特等人影响下进行的“社会神话研究”。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论著有《写作的零度》(1953)、《神话学》(1957)以及一些论戏剧的文章。<sup>[1]</sup>巴特的这些研究实践确立了一种对当代文学、文化研究影响深远的“神话学”方法，这一方法是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的奇妙结合。巴特用“神话”(myth)一词来讥讽各种文学、文化符号所生产的意识形态观念。他认为，我们完全生活在时代的矛盾之中，讥讽可以成为我们获取真理的条件。<sup>[2]</sup>“神话学”则研究文化符号生产意识形态并将其“自然化”的内在机制。“神话学”(Mythologies)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方法，有助于分析文学、文化文本生产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观念的内在运作机制，它还具有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假设，并对当代文学、文化批评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一、文学写作中否认历史制约性的意识形态神话

巴特认为文学写作不能仅仅看作是表达作者个人的某种体验或采取的个别形式，譬如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写作形式等，而是将一种语言外之物强加于读者，这种语言外之物既是历史又是人们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文学记号的表层形式的历史可以十分清晰地表现出它与深层历史的联系。历史在文学写作中以一种“形式性的现实”存在，它独立于语言和风格。<sup>[3]</sup>这可以从法国古典写作和现代主义写作的比较来加以说明。

法国古典写作是指1650年到1850年期间的各种不同文学风格的写作。在此之前，法国写作主要从事于对自然的认识，文学语言具有相当自由的美学丰富性，而在1650年之后，法国写作则热衷于对人的本质的表达。<sup>[4]</sup>法国古典写作以表达明晰而准确自夸，将自身确立为写作的普遍模式。到了19世纪，法国古典写作被公认为是唯一合理的写作方式，是一种自然的风格，完全适合于准确地反映现实。

在巴特看来，法国古典写作形式并不是一种普遍的、唯一合理的写作形式，相反，

“古典写作显然是一种阶级的写作”。<sup>[5]</sup>它于 17 世纪产生于直接围绕着权力追求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斗争中。它借助于资产阶级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宣布为社会普遍的意识形态的独断论而形成,并迅速地清除了由于民众自发的主观精神才得以建立的一切语法规程序。它的“明晰性是一种纯修辞学的性质,它并不是适用于一切时代和所有地方的一种语言的通性,而只是某种话语的理想的附属物,这种话语受到一种永久性的说服意图之支配”。<sup>[6]</sup>因此,法国古典写作实质上不是一种自然的、中立的、能够明晰地准确再现现实的写作形式。它之所以当时被公认为是唯一合理的写作方式,是因为在其背后支配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当时社会接受为一种合理的意识形态。法国古典写作曾经被视为是一种普遍的唯一合理的写作形式,在今天看来这只是一意识形态神话,它只是试图以其准确反映现实的修辞学掩盖其历史性、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从而隐蔽地将历史的东西转变为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然的东,服务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说服意图。到了 19 世纪中叶,当修辞学的特点不再引起兴趣之时,古典写作分崩离析了,曾经被认为是普遍的、合理的写作形式的神话破灭了,它被各种现代写作方式所取代。

从表面上看,古典写作的危机是它的写作修辞学的危机,而巴特认为古典写作的危机实质上是由于法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在 1850 年前后,三件重要的新历史事实汇聚在一起了:欧洲人口统计学的反转;冶金工业取代了纺织业,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法国社会变成了三个敌对阶级。”<sup>[7]</sup>第一件事是指在欧洲城市人口开始超过农村人口,这意味着欧洲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法国社会成为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三足鼎立的社会。因此,法国社会进入了一种新的历史语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地位动摇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不复存在,法国社会三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相互角逐。因此,古典写作作为一种自然的准确反映现实的写作形式的性质也受到质疑。

1850 年以后,法国文学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写作形式,即“零度写作”或“白色写作”。即写作反映社会阶级的功能为“零”的写作。“零度写作”在语言修辞学上表现为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一种新闻式写作。它自认为是一种中性的新写作。虽然它存在于各种社会阶级的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它自认为是由后者的“不在”所构成。<sup>[8]</sup>“零度写作”自夸为是一种“新闻式的”、“纯洁的”、“毫不动心的”写作,它不“介入”,亦即不对现实发表任何评论和判断,没有任何说服的意图,是一种透明的语言。这种透明的语言首先由加缪在其《局外人》一书中加以运用,而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则是这种写作的典型代表。与传统文学迥异,“新小说”宣称不再以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去看待客观事物,不再给事物涂抹上各种意义与价值(情感的、社会学的、伦理学的以及形而上学的等等),而是力图把客观世界从与人的关系中抽取出来,使其以中性的面貌呈现出来,即“设法建立一个更坚实、更直接的世界,以取代那个‘意义的’(包括心理的、社会的、功能意义的)世界”。<sup>[9]</sup>在格里耶看来,“政治生活不断地迫使我们设想某些公认的意义:历史的意义,道德的意义。”<sup>[10]</sup>然而,这些意义过去

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提供的，“新小说”不再相信这些僵化凝固、现成的意义，并拒绝提供任何新的文化意义，而只是提供对于客观世界的“表层”描绘。“新小说”自认为是一种力图客观地再现现实世界，同时又不赋予其任何文化意义、价值观念和形而上学阐释的努力，一种以情感和价值判断上的“不介入”来摆脱社会各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写作努力。

尽管格里耶的“新小说”可以看作零度写作的典范，但巴特认为“没有什么比一种白色的写作更不真实的了。”<sup>[11]</sup>“零度写作”希望独立于法国社会各阶级意识形态斗争之外，逃脱意识形态的干扰，实质上它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以“对一种绝对齐一性的社会状态的期待”来抵制社会各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有关现实的意义分裂，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乌托邦投射到文学写作上的乌托邦。<sup>[12]</sup>因此，巴特认为“零度写作”作为一种现代写作同整个现代艺术一样存在着一种双重假定：一种断裂的运动和一种降临的运动。它既具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史的梦想。作为一种必然性，它证明了语言的分裂，这种分裂又是与阶级的分裂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自由，它就是这种分裂的良知和超越这种分裂的努力。<sup>[13]</sup>

因此，对于文学写作来说，历史制约性是一种无法逃脱的牢笼，一切写作都是受历史制约的。那些自认为可以创造出一种摆脱历史制约、具有超历史的普遍性的写作都是一个有关写作的意识形态神话。只是文学写作与历史联系的形式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并且这种联系不能用直接决定论的观点来加以理解，从而否认作家选择历史的对象和个人创作风格的自由。<sup>[14]</sup>

## 二、语言结构是文学写作的支配力量

巴特认为历史对文学写作的制约性往往通过语言结构对文学写作的制约性表现出来。因为“语言结构是某一时代一切作家共同遵从的一套规定和习惯。”<sup>[15]</sup>“穿透语言结构的是整部历史。”<sup>[16]</sup>“对于作家来说，历史像是在若干种语言伦理中所面临着的一种必要选择。历史迫使作家按照他无法掌握的诸可能性因素来意指文学。”<sup>[17]</sup>巴特认为，索绪尔受埃米尔·涂尔干的影响，将语言结构视作一种社会事实而不是个人的行为。巴特接受了索绪尔的这种观点，也把语言结构视作一种社会性的制度系统。<sup>[18]</sup>

在分析叙事体小说的写作时，巴特认为简单过去时中动词的使用和第三人称的用法，都存在赋予叙事以秩序的功能。<sup>[19]</sup>在简单过去时中，动词暗中成为了叙事的因果链的组成部分，它参与了一个互相联系的朝向某种方向的行为组合，并且将时间性和因果性相联系从而引进了过程的观点，使叙事变得可理解。因而，简单过去时成为了构造世界的理想工具。在它背后永远隐藏着一个作为造物主的叙事者。同时，简单过去时作为一种运作的记号又能够快速地把一种原因和一种目的结合起来，它使故事中的人的活动具有了意义，摆脱了生存的不稳定性，获得了一种代数式的稳定性和图式。因此，简单过去时最终就是一种秩序的表现，人们在获得这种秩序时也就产生一种欣快感。

其后，在其符号学中他例举了服装语言结构、饮食语言结构和家具语言结构等。<sup>[20]</sup>如组成饮食语言结构的成分是：1、排除规则，即饮食禁忌。2、有待确定的诸单元间的意指性对立，如甜与咸的对立等。3、同时性（指同一份菜）或相续性（指一套菜）的联合规则。4、用餐礼仪。

因此，巴特认为语言结构中词汇之间的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聚合关系实质上反映了某一时代的各种社会性规则和习惯。语言结构中的这些词汇的选择及其之间的联合关系对文学写作的制约实质上是各种成文和不成文的社会制度的制约。正如英国学者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在论述巴特这种观点的启示时说：“世界存在着，但其可理解性要依赖意义的各种代码或者各种符号系统，如语言。这些代码和符号并不是普遍地既定的，而是历史地和社会地针对存在于它们背后的特定利益和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才绝不是单纯的。意义并不是某种既定的东西，也不是可以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它是根据历史地变化着的各种代码、惯例和符号系统制造出来的。”<sup>[21]</sup>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文学写作和其他写作认识和再现现实就是通过各种符号系统去建构和生产有关现实的各种文化意义，而这种意义生产总是在某一特殊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其背后总有某种权力和利益关系存在，因而这种认识和再现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性。

巴特把语言结构对文学写作的制约性比喻为“人类的一条地平线”。<sup>[22]</sup>此地平线把被禁止者和被允许者分开，而不在询问有关这种禁忌的根源或理由。因为地平线给人类的认识划分了一条界限，地平线以上部分是人类所能认识到的，而地平线以下则是人类不能认识的。这已经成为一种“自然”。这就是说，语言结构像是一种‘自然’，它全面贯穿于作家的言语表达之中。它给作家的文学写作划定了一条界限，如同地平线那样，因而它的性质是否定性的。<sup>[23]</sup>因此“语言结构是一种行为的场所，是一种可能性的确定性和期待。它不是一种社会性承诺的场所，而是一种无选择余地的反射，是人类的而非作家的‘未分财产’。它存在于文学的惯习之外，它是按其本性而非由于选择而成为社会性对象的。”<sup>[24]</sup>由此可知，语言结构作为作家的行为场所和地平线，既给作家的写作提供了写作的平台，但又是给予作家以进行自由选择的范围，因而是一种限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囚禁作家写作活动的无法逃逸的囚笼。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类运用语言去把握事物，离不开对事物进行分类，分类则是赋予事物以秩序。“秩序既意味着分配又意味着威胁。”<sup>[25]</sup>因而所有的分类都是压制性的。正如英国学者马克·J·史密斯所言：“当我们描述、归类我们所观察之物时，文化价值一直在发挥作用；当我们对事物分类时，我们也在对它们下判断。在我们为事物命名时，我们也在以一种等级秩序和道德价值的评估来赋予它们一个名分和位置。通过我们所使用的同样的词语，我们赋予所谈论的事物以价值。”<sup>[26]</sup>所以，人类语言对人类用语言所把握的事物具有强暴作用。正如巴特援引雅各布森指出的，一个习语与其说是按照它允许去说的来定义，不如说是按照它迫使人说的来定义。<sup>[27]</sup>因此，语言结构是一种

法规，其中存在着权势。说话，严格地说是福柯所讲的发出话语，它并非是人们通常强调的是在沟通，而是在使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被普遍化了的支配力量。”<sup>[28]</sup>它包含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异化关系。

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巴特发现语言结构也要为权势服务。因为语言中必然出现两种范畴：断言的权威性和重复的群体性。从前者，语言具有直接断言性，它包含着否定、怀疑、可能性和终止判断等特殊机制，它们参与语言的各种伪装作用。譬如，人们经常使用“请”的情态词就表明人们企图弱化语言结构的不可改变的确认力量。从后者，构成语言结构的记号是追随者、合群者。因为记号不断被确认和不断被重复而隐藏着固定型式。因此，每当人说话时，这两个范畴都在人心中发生作用，于是在语言结构中人既是主人又是奴仆。<sup>[29]</sup>

巴特认为，语言结构作为文学写作的一种支配力量并没有消解作家的创作自由。因为语言结构在文学之内，而作家的个人写作风格则在文学之外。<sup>[30]</sup>虽然作家不可能将自己的自由插入不透明的语言结构中去，因为穿过语言结构的乃是整个历史，其完整性和统一性犹如自然本身。然而“风格的所指物存在于一种生物学的或一种个人经历的水平上，而不是存在于历史的水平上”。<sup>[31]</sup>它是作家个人的孤独自我，是文学惯习的私人部分，产生于作家神秘的内心深处，却延伸到他的控制之外。所以，作家的个人写作风格如形象、叙事方式和词汇等都是从作家的个人身体和经历中形成的，并逐渐成为其艺术规律机制的组成部分。因此，作家的写作风格同社会无涉，却向社会显现。<sup>[32]</sup>在这种风格的名义下所形成作家自足性的语言，由于它只浸入作者个人的和隐私神话学中，属于一种言语的形而下部分，形成语言与事物最初的对偶关系。

严格意义上，作家个人的风格是不可认识的，人们无法弄清它产生的缘由，因而它存在于文学研究之外。因为它作为作家个人的一个未知的而又隐秘的本能的装饰性声音，是一种发生学现象，是作家个人性情的盲目的和固执的蜕变之结果。巴特把作家个人写作风格比喻为作家思想的“垂直和单一的维面”，即反映的是作家个人的独特的纵向的生活经历。

因此，巴特认为“语言结构的水平性与风格的垂直性共同构成了作家的一种天性”。在语言结构中作家发现了历史的熟悉性，而在风格中则发现了本人经历的熟悉性。<sup>[33]</sup>因此，语言结构与个人风格都是某种盲目的力量，而作家的写作则是一种历史性的协调两者的行为。由此，巴特认为文学既是绝对现实主义的，因为只有现实才是文学欲望的对象；同时文学又顽执地要求自己是非现实主义的，因为它认为文学对不可能之事物的欲望是合理的。<sup>[34]</sup>

### 三、语言结构将历史转变为自然的内在机制

巴特认为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它的真正原理是“把历史转变成自然。”<sup>[35]</sup>各种意识形态“神话”都是把社会和文化方面特殊的、历史的东西转变为自然的、必然的东西，

力图以一种永恒性、自然性来掩盖自身的历史特殊性和可改变性。神话作为一种言说方式也是“一种意指形式”。这种意指形式的特点是颠倒，亦即把社会和文化之物逆转为“自然”之物。“神话什么也不掩盖，它的功能是扭曲事物，而不是使之消失。”凡是使用这般意指形式的，都是在制造神话。神话成了社会习惯和意识形态。

神话的意指形式生产过程都需要“符码”的存在，因此巴特选择了运用语言学对记号进行研究的方法，分析一切符号学事实和意指现象。

在索绪尔那里，作为语言学的记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而组成。能指构成语言的表达面，所指构成语言的内容面，它们两者结合构成一个语言意指系统。巴特认为，符号学的记号与语言学的记号类似，也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但是它的内质却可以各有不同。这表现在，符号学系统出现了两类记号：一类是不介入意指作用的表达内质的记号，如衣服是用来御寒，事物是用来充饥的，它们的意指是自然产生的，没有人为的意图；另一类是人有意介入意指、具有某种人为意指目的的记号，如衣服意指御寒以外的功能如人的社会地位等。前一类记号表达的是事物的自然功能；后一类记号表达的是社会功能，它是特定社会赋予的。<sup>[36]</sup>前一类记号是语言记号，它的社会约定已被自然化。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解释，语言记号是先验任意性和后验非任意性的统一。巴特也认为它的意指是无理据性的。后一类记号的意指却是任意性的和理据性的，在这里实现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以及结合是否完善完全靠创造此类记号系统的意指活动的主观目的性和修辞学的说服能力。<sup>[37]</sup>

因此，符号学的意指系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级记号系统是一个语言学记号系统，它由能指和所指结合成一个语言学记号并产生意义，又可称之为直接意指记号系统。第二级记号系统是巴特用来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符号学记号系统，又可称之为含蓄意指记号系统。它的能指由第一个系统的记号构成，它的所指与某个文化意义或意识形态相联系。

巴特又把第一级记号系统称为“外延系统”，第二级记号系统称为“内涵系统”。他说：“涵指的能指被称作涵指项，它是由被直指的系统的诸记号（被结合的能指与所指）所构成的。至于涵指的所指，它的性质既是一般的、完整的，又是分散的。或许可以说，它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些所指同文化、知识、历史密切相通，可以说正是因此之故，外在世界才渗入记号系统。”<sup>[38]</sup>记号的“外延意义”大致相当于一个记号的字面意义，即指称，作为语言学记号它的意义是单纯的、被普遍认可的。记号的“内涵意义”不太固定，它是与各种广泛的文化主题、概念和意义联系起来的“联想意义”，也更为多变和不确定。它包含着广泛的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它是社会历史、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进入整个文化符号系统的通道。

具体而言，作为一种言说方式的“神话”的记号意指系统是“第二级记号系统”，即“内涵系统”或“含蓄意指系统”。神话之所以能够构成，扭曲之所以能够实现，乃

是由于作为“神话”的“第二记号系统”即含蓄意指系统的“能指”已经由作为语言学记号系统的“第一记号系统”即直接意指系统的记号形成了。如上所指出的，直接意指系统的记号是语言学记号，它的意指先验约定，不需要理据，是自然的。当它转为含蓄意指系统的能指时，就使含蓄意指系统中的“所指”即文化意义或意识形态自然化了。这也就是在保持直接意指系统的能指不变的情况下，扭曲、改变直接意指系统的所指的内容、意义，使同样的能指形式负载不同的所指内容或意义，使这所指的内容或意义得到集体的认同，从而将文化意义、意识形态自然化。

巴特运用上述方法对一本法国杂志《巴黎竞赛》封面上的照片进行了解读。在这张照片上，一个身穿法国军服的黑人青年正在敬礼，双眼上扬，可能注视着法国国旗。在“第一记号系统”即直接意指系统层面，一般读者都能将视觉形象中的每一个能指译解为某个恰当的所指概念：一个士兵、一套军服、一只举起的胳膊、扬起的双眼、一面法国国旗等等。这些能指形象与所指概念的结合在一般读者那里产生了简单指称意义：一个黑人士兵正向法国国旗敬礼。但是巴特认为对这张照片的解读不能停留于此，它还有更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意义，这可以通过解读“第二记号系统”即含蓄意指系统来得到。在含蓄意指系统中，它的所指的意义可以解读为：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子民，没有任何肤色歧视，都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服务。这就意味着法国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不仅不能受到批判，反而是值得肯定甚至称颂的。

在符号学上，由于作为直接意指系统的记号：一个黑人士兵正向法国国旗敬礼，是一个语言学的记号，获得了集体认同，是合乎自然的。因而当它构成了含蓄意指系统的能指时，这就使得含蓄意指系统中的所指的意义：肯定和称颂法国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无形中被自然化而含蓄地获得了集体认同。这就使得作为“第一记号系统”的各个能指（照片中的视觉形象）和所指（士兵、国旗等概念）的结合而构成的一系列带有单纯的直接意指信息的记号被联系到宣扬法国历史上的殖民主义的一个意识形态主题。

巴特认为，含蓄意指系统的能指的集合处在聚合的、隐喻的领域，有各种能指可供选择，因而是种修辞学。因此，对意识形态的能指方面进行研究就成为修辞学的任务。现代修辞学的发达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向社会各个领域的无形渗透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 四、结语

索绪尔的语言结构主义认为：“现实不是被语言反映出来，而是由语言生产出来。”<sup>[39]</sup>“语言是人类心灵的窗户”，没有语言符号内部的差异结构，人类意识和外部世界将是混沌的。这就是说，现实事物及其意义并不来自于其本身的性质，而是由语言系统内部的差异结构所生产的。巴特的“神话学”继承了索绪尔“构成主义”的意义理论，在现实与语言的关系上，也坚持语言建构现实而不是反映现实。神话是一种“言语”行为及其结果，但其本质不在自身，而在于“言语”背后的“深层结构”。然而，在语言与

现实的关系上，过去流行的观点是坚持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语言仅仅是反映现实而不能塑造现实，语言被视作工具。索绪尔和巴特反对此种观点，认为它陷入了语言工具论和现实决定论的客体主义。但是，索绪尔和巴特主张语言塑造现实和建构现实的构成主义观点是否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了语言本体主义。现在有许多学者认为，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上应该探索两者之间的综合，人类的语言结构与现实实际上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对于意义生产机制的分析，是形式的、共时的、抽象的，尤其缺乏社会与历史维度，它无法解释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关系中现实社会的面貌和权力关系如何确定事物的意义，也无法解释如何建构当时的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系统。

巴特的“神话学”通过把社会历史及其意义与价值系统纳入各种文化符号的意指结构之内，打开了经典结构主义封闭的语言结构，把社会历史作为语言结构生产文化意义的外部语境。巴特的“神话学”贯彻了一种有关事物意义的历史主义，即事物的意义赖以产生的各种文化符号及其代码都是特殊的、历史的、可变的，因此事物并没有固定的本真的文化意义，事物的意义是在特定社会结构、权力结构之中由各种文化符号所生产和建构的。巴特说：“我们可以想象十分古老的神话，但不存在永恒的神话；因为正是人类历史把现实转变为言语，而且是历史本身制约着神话语言的存亡。不管神话是否是古代的，它只能有一个历史基础，因为神话是一种由历史选定的言语。它不可能从‘事物本性’中逐渐产生。”<sup>[40]</sup>可以说，神话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它是社会权力结构在文化符号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各种神话“只能有一个历史的基础”，它不可能来自“事物的本性”，正是历史选定的“符码”决定着事物的意义以及有关事物的各种意识形态。

在“神话学”中，巴特力图将审视社会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观念系统生产的历史主义视野和人类符号系统生产的结构主义视野相结合，确认某一历史时期的语言结构与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系统构成一种互动关系。人们在特定语言结构中所从事的言语活动是一种文化意义的生产，生产着有关现实的意义与价值系统，这是人类语言对于现实的生产和建构维度；而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又最终决定着人类语言系统的意指实践所需要的符号和“符码”，从而制约着整个人类符号系统所生产的意义，这是人类语言对于现实的反映和依赖维度。因此，巴特的“社会神话研究”秉持着一种彻底的意义“构成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结合。当然，这种结合是否完美，人们是否都是依照巴特所认为的解读方式去解读语言记号系统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内容并加以认同都是值得讨论的。巴特本人后来发展出来的“读者性”理论也在某种意义上反驳了这种观点。

但是不能否认，巴特将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意识形态批评巧妙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另一方面发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被自然

化的秘密：意识形态已被纳入文化符号的意指结构之中。“神话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而是揭示了文化符号生产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观念的一般机制，从而对后来的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 参考文献

- [1] (法) 罗兰·巴特：《罗兰·巴特自述》，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 [2] (法) 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 [3] [4] [5] [6] [7] [8]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22] [23] [24] [25]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法) 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页、第29页、第30页、第31页、第32页、第39页、第40页、第44页、第45页、第4页、第6页、第7页、第10页、第17-19页、第7页、第6-7页、第6页、第147页、第147页、第148页、第148页、第7页、第7页、第7页、第8页、第152页。
- [9] [10] 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第264页。
- [18] [20] [36] [37] [38] (法) 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文集——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第15-17页、第27-28页、第36页、第70页、
- [21] [35] (英) 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3页、第129页。
- [26] (英) 马克·J·史密斯：《文化—再造社会科学》，张美川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 [39] (英) 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5页。
- [40] (法)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219页。

## On Roland Barthes Literature in Cultural Criticism “Mythology” Method

Long Jiajie, Xiao Xiaoya

(College of Marxism studies in hunan university, Hu Nan Changsha 410082)

**Abstract:** Roland Barthes believes that myth is a social history of things to be the natural way of expression. All ideologies deemed it a myth. “Mythology” methods not only analyze critique of the historic and temporary nature of various literar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eveals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has been involved in activities within the meaning of language symbol system so that the cultural symbols contained in the meaning of culture and ideology nature. The “myth” approach to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Keywords:** Roland Barthes    mythology    semiotics    Ideological criticism